

# 基督教聖公會與王元化家世淵源考

吳琦幸

---

**[提要]** 基督教家庭及思想對革命者王元化的影響，是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家庭如何接受西方現代思想的有意味的案例。作為一個十七歲就參加革命的青年，王元化在歷經各次政治運動和冤案中，面對命運的坎坷並以堅定的意志去戰勝它，在最後的歲月中反思造成中國近代以來的激進思想的根源，都與這個背景有關。本文揭示了王元化思想脈絡中不為人熟知的另一面，並用考證的方法提供了大量這方面的史料。

**[關鍵詞]** 基督教 聖公會 王元化

**[中圖分類號]** B978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8) 04 - 0086 - 11

---

19 世紀對於中國和中國人民來說是一個特殊的時期。在此之前，中國文化和傳統都是以老大自居。雖然也有外族的入侵和佔領，但只是趁一時的內亂而把政權暫時奪過去。在文化方面，這些民族仍以中華文明為宗。19 世紀到中國來的英美法各國不僅帶來了貿易、機器、軍事和科技的最新成果，而且還帶來了思想文化的創新。雖然列國用武力轟開了中國的大門，但一旦打開了，就無法阻止新的事物湧進，其中尤以基督教來到中國之後所帶來的震動為大。<sup>①</sup>對於基督教在近代中國思想文化上的影響，尤其與知識分子的關係，至今研究不夠。事實上，從 20 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中國大陸，不僅是基督教，所有的本土或外來的宗教都處於受壓抑的狀態。這種狀態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特別是從西方傳播進來的宗教，如天主教和基督教，從定性為“鴉片煙”和“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精神奴役”之後，當局就將它打入敵對勢力的一方，對其影響和貢獻卻諱莫如深。直到八十年代，知識界解放思想，敢於正視宗教對思想文化的影響，發表了一些研究宗教的論文，但也僅在理論層面上進行探索。至於宗教對個人的精神世界、世界觀的具體影響以及具體到知識分子精神世界本源的探究，還遠遠不夠。

以九十年代反思受到思想界矚目的學者、曾擔任過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王元化為例，其家庭背景及其本人精神世界與基督教的關係，至今尚沒有比較深入的研究。這種現象並非個案，在研究近代學人的學術和思想方面，這個領域終究沒有深入接觸。無論如何，這種現象直到九十年代之後開始有了明顯的變化，“促使許多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真正告別以往批判宗教、抵制基督教的政治御用歷史，告別對世俗的眷念和追求，而基於一種全新的認知視野、獨立的學

術地位和超越現實政治考慮的立場來重新審視基督教，深入、全面、公正、唯實、求真地研究和闡釋基督教的精神、價值、意義及知識體系，旨在以其嚴肅的學術良心和人格自尊來向中國人介紹一個全面而公允的基督教。”<sup>②</sup>客觀地認識王元化本人及其家族與基督教聖公會之間的關係，或可管窺近代基督教精神和思想對中國左翼知識分子在走上革命道路之後的影響。而在這一個背景下考察王元化的學思歷程，更可以對王氏自我認定的第三次反思獲得更深層次的認識。

### 一、對於基督教家庭背景的漸進式認同

王元化出生於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其父母、祖父和外祖父輩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甚至包括他的眾多親友、問學的多位受業老師以及親密朋友，均為基督教聖公會中的同工。但這一背景在九零年代之前並不為外界所知。由於這種純屬隱私的家庭背景只能通過當事人口述才能夠得到確證，作為1938年初加入中國共產黨的王元化，對於這一背景的敘述雖然未必是諱莫如深，但也頗有保留，直到九十年代才逐漸地、有層次地對外敘述，慢慢地為外界所知。<sup>③</sup>

最早見諸文字的王元化個人小傳雖然在1988年就已經發表，該文對於他的基督教家庭背景卻一筆帶過。該文由王元化口述並由他的研究生執筆，是迄今為止最早公開發表的關於王元化生平的文字，在談到他的家庭時是這樣敘述的：“他的上輩可以說是我國早期接觸西方文化的新式家庭。外祖父桂美鵬是湖北沙市第一個牧師。他的母系親族幾乎都是當時的新式知識分子。但他在少年時代和他們接觸不多。他只和他的姨母桂德華十分親近。桂德華酷愛文學，曾去英國和歐洲其他地方求學，回國後在大學任教授，講授外國文學，對王元化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王元化的父親王芳荃與母親桂月華婚後即東渡日本（父親在日本教授英語）。因此他在家庭中沒有受到封建禮教的束縛。王元化回憶說，小時候他家從來沒有祭過祖，或奉行其他封建禮儀。”<sup>④</sup>

在此篇小傳中他並沒有強調他的基督教背景，著重強調的卻是這個家庭並未受到封建禮教的束縛，以此表明他自己出生在一個擺脫了中國封建傳統影響的家庭，這與當時認定五四精神的捍衛者、認為反傳統是天經地義的王元化十分吻合。如果粗心的話，我們看不出這個家庭與基督教的密切關係。但這段話對於瞭解八十年代的王元化本人如何看待他的家庭和中國文化卻具有重要的意義。與反思之後的九十年代相比，此時的王元化尚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公眾人物，他作為黨的地方宣傳部門領導，剛剛由於涉及一場理論風暴而遭到批判，即1984年發起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sup>⑤</sup>雖然他用他的方式抵制這場運動，但最後還是從上海市委宣傳部長職位上退下來（王元化正式不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一職為1985年5月）。在此之後，王元化可以用較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他所熱愛的學術思想研究，指導博士研究生，<sup>⑥</sup>並以其個人魅力和學術成就獲得學術界思想界精英的支持，創辦了一份思想政治性刊物《新啟蒙》，王本人在該刊的第一期發表了為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而撰寫的重要文章《為五四精神一辯》。<sup>⑦</sup>

促使他寫作此文的原因，是他對於海外華裔學者全盤否定五四而感到無法接受。在此文中，王元化意氣風發地“為五四精神一辯”，語帶辛辣而頗帶感情色彩地批評海外華裔學者林毓生、杜維明等人的觀點。<sup>⑧</sup>文章發表之後頗得當時官方的欣賞，在中共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上全文刊登，編者並且為該文重新改定題目《論傳統與反傳統》。王元化非常欣賞改定的這個題目，因為這樣使文章更加具有理論的權威性和更高的地位。如果在這個時候作者把自己的基督教家庭背景公開出來，並不合適。不僅是作者，而且作為支持作者的官方媒體都會處於不利的境地。由此可以見出王元化在八十年代還沒有完全擺脫功利主義色彩和意圖倫理的傾向，而這些正是王

元化在九十年代反思之後才“痛定思痛”，將五四以來的四種思維模式，其中包含了他自己曾經有過的思維方式寫進他的理論文章中的。

但是關於基督教家庭的出生和影響，隨著王元化進入一生中最重要的反思年代，他的表述就開始不一樣了。

1996年11月6日，他寫下了一篇關於家世的文章《陸丹林與革命史譚》，這是首次比較詳細談及他的基督教家庭背景的文章，“我出身於一個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小時候常常聽到母親講述上代長輩的故事，她講述最多的是我的外祖父。外祖父姓桂，名美鵬。他沒有走讀書人求功名的老路，而是在沙市當了一名傳教士。據說他還是聖公會頭一位由中國人擔任的會長，負責長江一帶的傳教會務”。<sup>⑨</sup>該文寫作源起於母親桂月華的去世，王元化從母親留下的雜物中，“清出幾張《聖公會報》（一九三九年第二十七卷第八期）”，仔細閱讀後，引起元化先生對於聖公會日知會與辛亥革命關係的興趣，從而瞭解到革命黨人借聖公會教堂或教會學校做革命機關的事蹟，其中比較重要的是在長沙、武昌兩處的聖公會（曾蘭友和桂美鵬都屬於武昌的聖公會），武昌的文華書院（曾蘭友），上海的聖彼得堂（這個教堂與王元化的三姨有著密切的關係）。而王元化的“父親青年時曾在文華書院（引者按：由基督教聖公會創辦）就讀，後來又在那裡教過書。”而在武昌起義時，“父親到戰地去抬傷兵（引者按：在聖公會組織之下），民國成立後曾領到一張獎狀，父親把它配了鏡框，一直掛在牆上”<sup>⑩</sup>等等舊事。1999年，出版界和新聞界為了慶祝王元化八十歲生日，出版和發表了不少有關王元化的家世和個人背景的文章。傳記作家、記者李輝讀到這些資料之後，第一次知道了王元化家世的基督教背景，於是在採訪王元化的時候特意提起，王元化也進一步地回答了這個問題。他坦承：“我祖父那一代就是基督教徒，我小時候也受過洗。”<sup>⑪</sup>但是這裡他對自己家庭的基督教背景有所保留，並沒有說到他的父母和全家姐妹都是基督徒，只講了自己小時候受過洗。事實上不是小時候，而是一出生就住在外祖父桂美鵬的連襟、從青年起就同為聖公會的教友曾蘭友牧師的主持下受洗，此後在基督教的薰陶下成長。

1999年11月出版的由王元化口述編定、胡曉明撰寫的《跨過的歲月——王元化畫傳》中，對其家庭的基督教背景則有了更進一步的介紹。不僅外祖父桂美鵬是傳教士，還公開承認母親桂月華“也與元化父親一樣，信基督，甚至有更道地的傳教士家庭背景”。<sup>⑫</sup>不過他沒有詳細地說外祖父桂氏全家以及祖父母都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姐妹們也都信仰基督教，甚至他的妻子張可全家也都信奉基督教，僅僅對這個基督教家庭有這樣的描述：“北京生活還有一個經常去處，就是每週都要去附近一座小小的禮拜堂，參加英國聖公會教士開的‘主日學’”。“元化家裡，大家吃飯前總要背誦公禱文。一直到初中，這種儀式才不堅持了。”<sup>⑬</sup>1937年“七七事變”後，王元化全家遷往上海。到上海後的第二年加入中共，從此不再信教。<sup>⑭</sup>他再一次對於流行的將基督教教會學校視為帝國主義文化對華侵略的這種簡單化思維表示了不滿，認為“這樣說是不太妥當。我的外祖父桂美鵬是沙市的一名傳教士，他是基督教聖公會第一位由中國人擔任的會長，負責長江一帶的傳教會務。當時的聖公會和長沙的長老會是支持辛亥革命的，沙市的聖公會曾幫助成立日知會，這是一個帶有維新色彩的團體，創辦了書報展覽室和分班授課的學校，這所學校就以美鵬命名。由於日知會支持孫中山，還發生過一位教士被清廷逮捕殺害的事情。黃興參加基督教就是在沙市，這些情況我沒有聽父母說過，還是最近讀陸丹林的《革命史譚》才知道的。”王元化本人在讀小學、中學的時候上的都是教會學校。“讀大學時已經抗戰了，我參加了救亡運動，讀的大學不是教會學堂，而且我也沒有讀完大學。”<sup>⑮</sup>王元化後來沒有隨順父母的願望讀教會學校

並出國深造，讀的是上海的大夏大學，1939年肄業。至於他受到的基督教的影響，王元化對李輝說“恐怕就是《新約》中的基督教精神吧。西方19世紀，無論是俄國的、法國的、英國的、德國的文學作品……大抵都浸染了這種精神。這些作品是我喜愛的。這一點，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回憶日偽統治時期說到過：‘上海成了一個恐怖世界，我的許多藏書都自行銷毀了，自然更談不到發表文章。但幽居生活卻使我可以沉靜地思考。我對教條主義感到了厭倦。浸透著人文精神的西方19世紀文學，幾乎成為我當時的唯一讀物，引發了我的濃厚興趣。也許這是由於小時在家庭受到鄰人愛的基督教義的影響，使我對這些文學作品產生一種認同感吧。’直到今天，西方19世紀文學仍是我喜愛的讀物。解放後，我沒有在文章中談過蘇聯的作家和作品，因為引不起我的興趣。我談到過的是莎士比亞、費爾丁、狄更司、白朗底姐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訶夫、巴爾扎克、羅曼·羅蘭等，自然還有許多我喜歡而沒有在文章中涉及的作家，也大多是19世紀浸染人道主義精神的作品。”<sup>⑥</sup>

如果再深入發掘王氏家世以及長輩世交，即從王元化的祖父和外祖父，到他的幾位私淑老師如汪公岩、韋卓民、熊十力等，他們都信奉基督教，而且清一色屬於基督教聖公會（含日知會）一派。雖然王元化與李輝的對話中說道，後來成為共產黨員之後，“自然不再信教了。但基督教精神可能還會發生潛在的影響。”<sup>⑦</sup>在對於自己的文字近乎苛刻並且絕對字斟句酌的王元化筆下，這句話中隱含著的意義可以引申開來“從容含玩”。

## 二、王氏家世與聖公會

王氏家世的基督教背景，可以從外祖父桂美鵬成為基督教聖公會的第一代華人傳教士和聖公會沙市會長為起點。

基督教在西方歷史上不同的時期和地方，形成了不同的教派。聖公會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教派。該教派也翻譯成聖公宗（英語：Anglicanism，又稱安立甘宗），是源自英國（英格蘭）的英格蘭教會和愛爾蘭教會及其在世界各地衍伸出來的教會之總稱，一般被劃歸為基督教新教。今天的英國女王也屬於聖公會。後來聖公會通過清教徒從英國傳播到美國，得到了更廣泛的信眾擁護。由於該教派的最大特點是在教義上崇尚保守和傳統，尤其在家庭觀念和道德倫理方面比較守舊，在美國獲得了比源起地英國更為廣泛的傳播，今天在美國的許多城市鄉村都可以見到聖公會的教堂。後來美國聖公會於1834年決定來華傳教，第二年就派遣傳教士駱武（Henry Lockwood）和韓森（Francis R. Hanson）兩人乘坐馬禮遜號輪船，自紐約到廣州。其時清廷禁止傳教，兼廣州生活費用昂貴，無以為繼，遂改去爪哇。第一次的傳教以失敗而告終。1841年，聖公會再度派遣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來華，先是到澳門，1842年遷到廈門，1845年7月17日到達上海。從此以上海作為第一個教區，並利用當時最便利的交通工具——長江上的輪船延伸到中國中部的長江中下游省份傳教。武昌則是當時基督教聖公會傳教的第二重鎮。

桂美鵬（1845？～1911）出生在武昌的一個富裕家庭，成年之後信仰基督教，是聖公會最早的華人教友，也是中國第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識人。他與同屬教會教友的鄰居曾蘭友結為生死之交，後來分別娶了教友、當時武昌書香門第江家的兩個女兒。曾蘭友娶了姐姐江國祥，桂美鵬娶了妹妹江菊霞。如此聯姻，加深了兩人的友誼和感情，開啟了王氏家世與基督教聖公會的淵源。從青年起，他們即住在武昌陶家巷。1880年桂美鵬被武昌的基督教聖公會派到沙市創建教堂和學校，被委任為鄂西片區的牧師和第一任華人聖公會會長。他在沙市為推廣基督教做了很多工

作，黃興就是由他主持受洗而成為基督徒的。此後桂美鵬在沙市建了住宅，並在附近籌資建造了聖公堂，擔任首任堂牧，在教堂前創辦了美鵬學堂，這是當時第一所分班、分年級教學的新式學堂，從此全家定居在沙市。<sup>18</sup>桂美鵬同時保留了武昌陶家巷的舊居。1911年桂美鵬在沙市去世，此時王元化的父親王芳荃在清華學校任教，王元化的外祖母江太夫人率女兒桂月華並全家從沙市搬回到武昌。一家人在武昌陶家巷桂家的舊居生活，並在附近參加由曾蘭友主持的聖三一教堂禮拜及各種宗教活動。

曾蘭友始終在武昌傳教，受聖公會的委託，於1910年集資創建了聖三一教堂（Trinity Church）並擔任首任堂牧。這所教堂是聖公會在武漢諸多基督教堂中規模最大的一所，可以容納千人禮拜，位於今武漢市解放路363號。<sup>19</sup>除此之外，聖公會在武漢陸續興建了聖保羅座堂、聖約翰堂、聖誕堂、聖米迦勒堂、聖安得烈堂、仁主堂及聖救世主堂等眾多著名教堂，興辦的學校和醫院則有武昌文華書院（1871年創建，武昌文華大學、文華中學的前身）、彭劉楊路上的同仁醫院等。曾蘭友參與了文華書院的創建，後來成為該校的校董，並擔任自創的聖三一教堂三一小學校長。聖三一教堂的遺跡至今仍矗立在武漢市解放路口陶家巷附近的繁華商業區。教堂的部分建築曾經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改建為小學，已經無法辨認出教堂的原貌。這也是武漢僅存的三座中西合璧的大教堂之一。<sup>20</sup>曾蘭友一家曾居住在聖三一教堂院內。夫婦二人共有8個子女，也全部出生在這個教堂裡。曾、桂兩家世代住在這個地區。

1920年11月30日午時，王元化出生在武昌陶家巷桂家老宅中。此時桂美鵬已逝，曾蘭友按照基督教的儀式，親自在聖三一教堂為新生兒王元化主持基督教受洗的儀式。這也是王元化九十年代中提及自己受過洗的真實經歷。王家的孩子名字均由曾蘭友所取，以“元”字作為輩分之序。王芳荃鄭重地煩求曾蘭友為唯一的兒子取名。曾蘭友舊學淹博，對於中國古代典籍非常精通。他先是為王家小兒卜一卦，卦象為“恒，巽下震上”，卦辭說“恒，亨，無咎，利貞，利有攸往”，是一個吉卦。其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無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於是取名“元化”。

玩味這個卦象，其核心意思便是天地萬物的永恆存在，得日月四時的變化延續下去。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個“化”字，預示著生命中充滿永恆的變化。這種變化，正是由於個人的恒久而不已，貫穿始終的恒心和意志。這是否昭示著王元化一生命運的起伏跌宕、但恒久而不已？巧的是這“王元化”三字每字四畫，共十二畫，又蘊含著以耶穌十二門徒為學習榜樣之意。曾蘭友以中國傳統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結合在一起，願這個孩子持恒久之道，代聖人立言。<sup>21</sup>

曾蘭友取名頗喜用數字，大概跟他創辦三一教堂這個外來的基督教堂名字有關。不僅王元化的名字與姓均為四畫，而且他給自己的孩子取名也如此。曾蘭友的八個孩子，在中國近代史教育史上頗有地位，共五男三女。五個兒子從長到幼分別為曾憲五、曾憲三、曾憲一、曾憲九、曾憲七，女兒則有曾憲章、曾憲文、曾憲華。曾蘭友有意將一到九的單數全囊括了。中國文化中，單數為陽，雙數為陰。故男兒用單數。細觀這些數字的排列，也頗有講究。曾憲五、曾憲三名字中的“五”和“三”取自孫中山先生的“五權憲法”“三民主義”，足見曾蘭友對中山先生倡導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嚮往和追求。老三曾憲一生於1911年，當年辛亥革命爆發，推翻了清王朝帝制，開啟了新紀元，其名字中的“一”寓意“一統中國”。曾憲九的“九”字，則取自《禮記》。“錫”

在古代通“賜”字，“九錫”是指天子賜給諸侯、大臣有殊勳者的九種器用之物，有最高禮遇的寓意，表達父親對這個兒子的疼愛和厚望。“憲章、憲文、憲華”，一方面是曾蘭友對所鍾愛的基督教文華學院教育的紀念，更表達出對中華典章文明源遠流長的自豪。

### 三、王元化的祖父母與聖公會的關係

王元化在他口述並編定的《跨過的歲月——王元化畫傳》（簡稱第一版）中對父親的事蹟介紹較多，但在第二版《王元化畫傳》（簡稱第二版），有關父親的介紹刪了不少。在第一版中專闢一章有“王芳荃和楚蠻”兩節，在第二版上全部刪去。王元化祖父母的史料，則更少了，在第一版中只一句話：“父親曾說‘我們家的上代，是一個寡婦拉著兩個孩子逃到湖北去的。’”此說最早見之於前述陳禮榮所撰《清節自勵的王芳荃》一文，該文發表於2004年的《檔案與史料》第3期，從原文中摘登了由王元化提供的王芳荃親筆自傳。由此我們可以知道王元化祖父母輩的情況，他們是桂美鵬的沙市聖公堂中的基督徒。

王芳荃，字維周，清光緒六年（1880）六月出生於湖北沙市一個清寒的貧民家庭。他家祖籍江西，在清朝“湖廣填四川，江西填兩湖”時遷來湖北。“一個寡婦帶著兩個兒子從江西闖湖北”，就是指當年王芳荃的祖母帶著兒子從江西逃難到湖北江陵的故事。王芳荃的父親幼年一場大病，因家貧而耽誤了救治，以至於吃錯了藥，由聾致啞。但他身體健壯，聰穎伶俐，成年後就在沙市碼頭上做了搬運工。沙市是長江沿岸的重要碼頭，清末時，已成為中部棉花、糧食的轉運交易中心，乃至中日簽訂《馬關條約》之時，日本人點名要求在沙市開埠。此後十年間，沙市成為湖北最發達的新興城市之一，有“小漢口”之稱。父親年長後，與也是聾啞人的母親結婚，王芳荃是他們唯一的兒子。

1880年王芳荃出生時，家裡已一貧如洗，父親每日去碼頭扛包，母親只能在家做一些家務。童年王芳荃就幫父母料理營生，每天提著一個小藤籃子，裝上一些瓜子、花生、米子糖，到附近的學堂門口去賣，一天跑下來，掙得十來個銅錢交給母親貼補家用。到了8歲（1888年），他應該上學了，此時，家中的頂樑柱卻突然倒塌，父親被碼頭上的巡防營兵丁打傷了腰，困臥病榻，後來慢慢喪失了勞動能力，全家的生活來源落在了王芳荃的身上。八九歲的孩子，隻身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擔，他全天候地出外販售果子零食來維持生計。

王芳荃每天出外，最喜去的地方則是美鵬路的一個學堂。那就是桂美鵬在沙市創辦的聖公堂後邊的美鵬學堂。<sup>②</sup>小小的王芳荃每次到了這裡，居然不走了，除了可以出售食品之外，他還在外很專注地旁聽學堂中教師們講的神學、國學課程。時間一長，他在這裡提籃賣小吃的瘦弱身影引起了桂美鵬的注意。他看到這個聰明、伶俐的少年雖然只是在校外旁聽，學到的知識卻超過了一些在校就讀的富家子弟，心中暗自稱奇，而他的母親（即王元化的祖母）是桂美鵬辦的聖公堂的教友，<sup>③</sup>於是就讓他進校讀書識字。王芳荃以家中實情相告，無法來此上學。桂美鵬得知王芳荃家境貧寒，深為王芳荃在艱困之中好學的精神感動，為讓王芳荃免去後顧之憂，他在聖公會堂的後面清理出一間小屋，將他家年過半百的父母接來居住，並讓他的母親在教堂做一點雜事，每月付5元銀洋的工薪以維持生活。<sup>④</sup>其父對桂美鵬感激不盡，並在桂美鵬的宗教精神感召下，成為虔誠的基督教信徒。王芳荃進入學堂之後，充分顯示了他對於知識的渴望，聰穎的秉性充分發揮出來，求學如饑似渴，高度專注。一學期下來，居然門門功課都是第一。當然除了學習文化、科學等知識之外，基督教教義教理也是他學習的主要課程。清光緒十八年（1892），桂美鵬親自

送年方 12 歲的王芳荃去宜昌，到由美國牧師柯霖時 (H. C. Collins) 主持的英文學堂念書。5 年後，他作為聖公會宜昌教區的尖子學生，被選送到上海聖約翰學院就讀。

無論是宜昌聖公會教區的英文學堂，還是上海聖約翰學院（後成為聖約翰大學），均由聖公會創辦。此後王芳荃的生涯與聖公會緊密相連。

聖約翰學院的學制為預科四年，正科三年，學校的教學管理十分苛嚴，凡是當年功課不及格者，將處以留級重讀的處分，而當留級後再度考不及格，就要開除。王芳荃在預科四班（最低班次）讀了半年，經教師舉薦，提前升入三班。經過一段時間的調適，他很快就在班上以學習刻苦、成績優異而嶄露頭角。

王芳荃升入正科學習，其時家庭生計日益艱難，遠在故鄉的父母都已年近花甲，基本上喪失了勞動能力。為了完成學業，他通過院長卜舛濟的批准，一面在校內為預科低班學生做助教，一面去學校圖書館做兼職管理員，以此掙得一份菲薄的工薪，來苦苦撐持自己的學業。他僅用了六年時間，於 1903 年修完了該校七年學制的全部課程，順利地從聖約翰學院畢業，從此便開始了他持執終生的教師生涯。

根據王芳荃的自述，“先後在湖北宜昌、江蘇如皋等地教了兩年書，於 1906 年回到故鄉沙市結婚。”此處所指的如皋即如皋高等師範學校。根據該校所編《百年如師》一書中的檔案資料，“1903 年，學校延聘英文、算學教員姚述周。光緒三十年（1904）正月如師本科入學，同時新聘英文、算學教員王第祥（直隸順天人，上海約翰書院畢業）。”“英文算學教員王第祥係直隸順天人，英文算學教員王房全係湖北人。”<sup>⑤</sup>王房全即王芳荃，為他年幼時的名字。

王芳荃與桂月華的結縭也跟聖公會有關。“有陣子日本的大學請爸爸去教英文。我外公介紹自己的侄女給爸爸認識，讓他們試著談對象，爸爸嫌這個女孩沒學問，外公說可以培養她也去念書，爸爸說不行，自己心裡已經有人了，但不能說出來，因為這是不可能有的結果的。後來在外公的追問下，他終於說出這個人就是我媽媽。因為爸爸在做禮拜時看到過我媽媽，也聽人說過她如何漂亮、能幹。但當時媽媽不同意，擔心爸爸家裡太窮，自己會不習慣也沒面子。外公就勸她，你不用嫁到他家去，跟他一起去日本就行了。媽媽很愛外公，就聽從了外公的話。”<sup>⑥</sup>桂月華在家中排行老大，年輕時曾經跟隨芬蘭的傳教士女醫生學過醫，後來父親將她送往上海的聖瑪麗亞女校 (St. Mary's Hall) 學習，畢業於 1904 年。這同樣是一所由聖公會創辦的女子教會學校，最早的校址也在滬西。聖瑪麗亞女校在教會的資助和重視下，辦得非常出色，成為上海聞名的女子貴族學校，許多大家閨秀來到這個學校學習英文、國語、神學，進出該校的不少都是名門淑女。該校與聖約翰大學（當時為聖約翰書院）僅一牆之隔，而王芳荃此時正在聖約翰書院求學。

桂月華 1901 年入聖瑪利亞女校，1904 年畢業，回到沙市。王芳荃畢業後即回到湖北宜昌教書。估計兩人婚事的提及在這段時間中。王芳荃 1905 年去如皋高等師範教書，1906 年由桂美鵬推薦，到日本志成學校任教。當年王芳荃 26 歲，桂月華 19 歲，兩人在沙市結婚，共赴東洋。我們當然可以相信，這樁婚事是在雙方家長的贊同下完成的，尤其是從 1888 年桂美鵬初識王芳荃以來，這位被稱為王家恩人的堂牧始終關注著王芳荃這位貧寒家庭走出來的佼佼者，以其慧眼識得人才。

說到日本志成學校，也與聖公會有密切關係。該校設立在東京築地。<sup>⑦</sup>美國聖公會派人到日本傳教，於 1874 年創辦了教會學校立教大學。為幫助到日本留學的清朝留學生儘快適應日本的留學生活，1906 年於該校內附設一所以清朝留學生為對象的附屬學校作為預備教育，教授英文、

法律等科目，即志成學校。王芳荃通過聖公會的介紹，在志成學校獲得了一個教英語的職位。夫婦倆1906年東渡日本，計在日本生活了四年。1910年，王芳荃夫婦回國，王任教於同樣是由聖公會創辦的武昌文華大學。翌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黎元洪特聘聖公會教會醫院的外籍醫師麥克威廉（Mcwillie）參與軍政府工作，一則協助與各國駐漢領事館交涉商洽對外事務，二則組織紅十字會開展戰場救護行動。由麥克威廉醫師推薦，特聘王芳荃當他的隨行翻譯。

《革命史譚》一書中記載了聖公會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黨人借教堂或教會學校做革命機關，有在長沙、武昌兩處的聖公會，武昌的文華書院，上海的聖彼得堂。”王元化在這段史料後說：“我父親年青時曾在文華書院就讀，後來又在那裡教過書。”此處他誤將宜昌的柯林斯的英文學堂記憶為文華書院。但是王芳荃教過書則是準確的。他還說“父親到戰地去抬傷兵”，就是指受麥克威廉醫生所聘任隨行翻譯，當然也參加了抬傷兵。10月27日，清軍以三個混成協（旅）的兵力，猛攻漢口；江面上趕來助戰的水師炮艦，也以猛烈的炮火朝革命軍陣地狂轟濫炸。戰至31日，革命軍反攻失利，節節敗退，陣地上一度傷亡慘重，血流遍野。在陽夏保衛戰的緊要關頭，王芳荃和紅十字會的醫護人員一道，穿梭於大街小巷的炮火硝煙之中，抬運傷兵、救護飽受戰火蹂躪的平民百姓，一連十數日不下火線。鑒於他在這場戰爭中所作出的傑出貢獻，中華民國成立後特頒他一枚勳章，以志嘉獎。<sup>②</sup>

1912年1月，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王寵惠出任外交總長，麥克威廉有心向王寵惠舉薦王芳荃去搞外交。王芳荃聽說這一消息後，當即婉言謝絕了醫生的好意，他表示此生唯願做一名普通教師，而無意於涉足官場。此時，由美國政府退還“庚子賠款”所開辦的清華學堂已經開始招生了，這所學校中的相當一部分教職員工都屬基督教聖公會，經推薦、遴選，王芳荃作為首批錄用的教職人員，奉調到北京在該校任英文教師。1913年，學校派他前往美國留學，後獲芝加哥大學教育學院碩士學位。1915年，王芳荃回國，繼續在清華任教。

縱觀王芳荃的一生，1903年開始獻身教育事業，此後沒有離開過教育。早在抗戰之前，他的生平小傳就被收入由中國圖書大辭典館編輯出版的《民國名人圖鑒》。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默默無聞地在北京鐵道管理學院（後改為北方交通大學）任教。當時人民政府在公教人員中進行履歷登記手續，據他自己說，雖然長期從事教學工作，但並沒有參加正式意義上的宗教活動，但考慮到其自幼即受教會資助讀書，後來又去美國取得學位，因而還是在“宗教”一欄中填報為“基督教”。在“文化大革命”期間（1973年）時寫的“自述”中，老人曾這樣敘述了他當時的初衷：“我想，共產黨是無神論，不喜歡人隱瞞，要人說真話。”<sup>③</sup>由此可見，作為基督徒的王芳荃，在最後承認自己的宗教信仰時顯示了他的勇氣。

#### 四、基督教精神對王元化的影響

王元化似乎對他身上的母系文化血統，更為看重。他常常對人說起他的那些相當成功的母系親族，他們確實是一些得時代風氣之先、最早沐浴歐化的春風春雨的新型知識人。在他母系親族中，外公桂美鵬顯然是最舉足輕重的人物，也可以說是核心人物。作為基督教聖公會沙市第一任會長，他在基督教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但更重要的是，這個家庭的所有人以及重要的社會關係都是在由桂美鵬信仰的基督教的影響下成長，形成了一種非常強化的家族氛圍。那就是後來王元化自己在九十年代總結的：



我覺得基督教家庭對我的影響有兩個重要方面，一是人人都是有缺點的，莎士比亞也說過類似的話，雖然他不是基督教而是異教，但他的話也體現了這種精神，他說，“上帝造人，為什麼要他先有了缺點，才成為人？”基督教有原罪說，每個人身上都有與生俱來的罪，所以人不可以成為一個神。恰恰因為如此，對人身上的缺點，可以採取一種諒解、寬恕的態度，而不是非得嫉惡如仇。其次，基督教給我們的好處，是人可以比較謙虛，不覺得人可以和神一樣，所以我年輕時對領袖沒有什麼崇拜，對魯迅我是有一些崇拜的，但沒有到偶像的地步。二次文代會，我到北京第一次見到毛澤東，許多人都懷著虔誠膜拜的神情擁過去，我覺得自己沒有這個情緒，只有我這樣站著，內心不免有些惶恐。這大概就跟基督教有點關係，因為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sup>⑩</sup>

這段話說出了基督教的基本思想。西方的基督教，建立在“凡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無論他多麼努力；包括堯舜孔子在內，只要他們是人，就不可能成為十全十美的聖人，就不可能做人類精神的導師。”<sup>⑪</sup>而這也是貫穿王元化一生的為人和信仰的重要注解。從1938年他入黨並參加地下黨的文化工作，就對很多事情保持著自己的獨立看法。年輕的王元化這個階段的思想資源除了魯迅，就是基督教的上述兩個方面的影響。因此他才會在“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後，元化對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的想法有疑義，在黨內學習會上談了自己的看法。”他才會“在當時還是以後的文學研究生涯中，他都不會因為外在的原因而放棄自己所確認的（觀點），這或許又是他早年從父親以及後來從地下文委所受到的精神影響！”<sup>⑫</sup>

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遭到胡風一案的牽連而被打入另類，更需要一種宗教的力量來幫助他度過難關。他刻意讀書以獲得精神力量，親人們給了他家庭的力量，基督教則給了他第三種力量，那就是在遭受磨難時候對人的信念，對真理的信念以及對命運的信念。他在1997年3月5日的日記中寫道：“一九五五年的政治運動，精神的受傷；六十年代初撰寫文心東釋時突然舊疾（靜脈周圍炎）復發，右眼失明，只得輟筆；‘文化大革命’再一次被隔離，心因性病再一次襲擊了我；‘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政治處境好轉，平反在望，可是張可突然中風了；晚年又因另一種不幸，使我不斷咀嚼痛苦，命運使我一生坎坷，不是政治打擊，就是痛苦的折磨，幸而都度過了，可是又失去了生活的寧靜。我要忍耐命運的顛簸，像《舊約》中的約伯一樣。”

王元化將自己命運中的苦難寫得非常含蓄，我們不必去探尋他除了政治打擊和痛苦的磨難之外的悲劇命運，但王元化把自己比作《舊約》中的約伯那樣經受人間無數的苦難，涵義值得玩味。《舊約》中的《約伯記》是一部具有哲學、文學和神學三重價值的宗教書，其根本還是傳道書。王元化熟悉這本書，可見他對於基督教《舊約》熟知的程度。這不僅得自於少年功夫，而且在此後遇到苦難時，這也常常是他獲取力量的來源。該書不僅文體優美，思想深邃，論題雋永，內容豐富，語言精闢，最重要的是它將人生最難應付的現實——苦難——呈現在讀者面前，從而對困擾世人的不解之謎——苦難，給予需要正確面對的指引。王元化的一生也在苦難的驚濤海浪中度過，與《約伯記》中的精神相呼應。他從中得到的是面對逆境的勇氣，從而接受命運的挑戰。

什麼是19世紀人文精神？那就是人的尊嚴和人的價值，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愛。王元化從小受到的家庭教育，耳濡目染著人道精神。自幼在教會學校讀書，薰陶的是基督教教育，在家中的基督教儀式，受過的洗禮，都是從小養成的，那時全家人每頓飯之前都要一起誦念公禱文。他本人對於《聖經》的熟悉程度並不亞於一個真正的教徒，並且善用這些經典，融匯到他的學術思想中。他在《近思雜記》中說：“記得小時候一位學聖品人（基督教牧師）的長輩對我說：《聖經》

上說的‘你要做世上的鹽’比‘你要做世上的光’更好，因為光還為自己留下了行跡，而鹽卻將自己消溶到人們的幸福中去。”接著，他感慨道，“作為大陸上的一個學人，我佩服那些爭做中國文化建設之光的人，但我更願意去讚美那些甘為中國文化建設之鹽的人，忘我無私精神總是值得尊敬的。”這裡王元化將《聖經》關於鹽和光的意義做了創造性的闡發。原文出自《新約·馬太福音·第五章》：“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門底下，是放在燈檯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原文並無做“鹽”好於做“光”的意思，均為耶穌以形象的比喻來勸說、鼓勵信徒們真正承擔起責任，身體力行上帝的道，從而把人間的榮耀歸給上帝。鹹味，是說某種無形而實有的效果；光照，是為了做人間的榜樣、楷模。

在王元化視之為最重要的九十年代的反思中，他總結自己的信仰歷程時說：“我認為，今天仍須繼承‘五四’的啟蒙任務；但是‘五四’以來（不是‘五四’時才有）的啟蒙心態，卻需要克服。我所說的啟蒙心態是指對於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過分信賴。人的覺醒，人的尊嚴，人的力量，使人類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紀。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視為萬能，以為可以無堅不摧，不會受到任何局限，而將它絕對化起來，那就會產生意識形態化的啟蒙心態。我生於一九二〇年，從小就受到‘五四’思潮的洗禮。我的科學信仰以及接下來的政治信仰，使我親身體驗過這樣一種意識形態化的啟蒙心態。這和我所讀過的那時被奉為經典的書籍有關。它們使我相信人的知識可以達到全知全能，從而認定英國經驗主義啟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歐洲大陸的理性主義啟蒙思想家相比的，因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論者，有著懷疑主義傾向。所以，休謨、洛克比不上盧梭，而在德國古典哲學家中間，康德又比不上黑格爾。因為前者多了一份懷疑，少了一份信念。這就是你所提到的偏識。”<sup>③</sup>

他很贊同有學者分析中國一些知識分子“往往自以為真理在握，必不許反對意見有反駁的餘地，接下來輿論一律、壓制不同意見，思想定罪，以至改造人性，發行思想，不都是這樣發生的麼？……我認為這對於繼承五四是不利的，但其影響不但至今未絕，且有變本加厲之勢，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sup>④</sup>

人不是神，人不可能達到全知全能的境界。一旦人把自己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視為全能，認為可以無堅不摧，人定勝天，把這種力量和理念絕對化起來，那麼這個世界就被一種封閉的意識形態所籠罩。而這些思想與王元化的基督教背景有著不無深刻的聯繫，值得後人慢慢咀嚼。因此我們體會到晚年的王元化喜歡引用黑格爾的下面這段話也就不覺得奇怪了：“老人講的那些宗教真理，雖然小孩子也會講，可是對於老人來說，這些宗教真理包含著他全部生活的意義。……構成理念的內容和意義的、乃是整個展開的過程。”<sup>⑤</sup>

①參見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總論”。

②卓新平：《基督宗教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359頁。

③在一九八零年代的中晚期，王元化只是對他的學生

和較為親近的友人講述他的基督教家庭背景。見吳琦幸：《王元化談話錄》，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27頁。

④1988年，應馮契先生主編的《時代與思潮》雜誌約稿之請，需要發表一篇王元化的生平小傳。由王元

化口述，他的三個博士生蔣述卓、陸曉光、吳琦幸參與記錄並由吳琦幸最後執筆的《走自己的路——記王元化教授》發表於該刊第一期。詳見吳琦幸：《王元化談話錄》，第122頁。

⑤王元化與王若水、顧驥為周揚起草紀念馬克思誕生一百周年的一份理論報告而被指觀點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此後即開展了一場清除精神污染的運動。

⑥1985年第一屆博士生有蔣述卓、陸曉光，第二屆為吳琦幸，第三屆為胡曉明，第四屆為傅傑。

⑦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時候改為《論傳統與反傳統》。

⑧此文以《論傳統與反傳統》在《人民日報》上刊登後，在海內外的影響很大。但到了九十年代，王元化改變此文的基本觀點。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否定了此文。

⑨⑩⑭⑮⑯⑰王元化：《人物·書話·紀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年，第184頁；第185頁；344頁；第345頁；第346頁；第344頁。

⑱《對五四的再認識答客問》，原載1999年11月《博覽群書》。見王元化：《王元化集》第六卷，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344頁。

⑳㉑胡曉明：《王元化畫傳》，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7年，第11頁；第29頁。

㉒筆者2015年專程去江陵，並在當地王元化家世研究專家陳禮榮的陪同之下，踏訪桂美鵬的舊居和教堂的遺跡（現在已經在原址上建了新沙路小學，教堂已夷為平地，惟剩下一塊當年桂美鵬書寫的石碑“聖公堂”，置於小學教學樓三樓的走廊中）。

㉓據《武漢市志（1840-1985）·社會志》記載：“1958年武漢基督教實行聯合禮拜，武昌聖三一堂人員併入生命堂，房屋被解放路小學佔用。”

㉔㉕筆者2016年與湖北經濟學院新聞傳媒學院教授張軍、王世立同往該處尋訪教堂遺址，並在陶家巷中採訪現在的居民，均是耄耋老人，他們已不知道當年的桂家和曾家了。

㉖㉗參見陳禮榮：《清節自勵的王芳荃》，上海：《檔案與史學》，2004年第3期。

㉘這條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改成新沙路，這所學校和教堂也改建成新沙路小學，今天只留下了當年在教堂前面置放的石碑，上面有桂美鵬的親筆書寫

“聖公堂”三個大字，與王元化的書法風格極像。這個1885年建立的教堂當年在沙市是數一數二的。前面是聖公會堂，後面則是美鵬學堂。

㉙見桂碧清《桂碧清老師口述記錄》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bfef410100a48k.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bfef410100a48k.html)。

㉚當時的五元大洋足夠一家人衣食無憂的生活。

㉛彭灘：《王芳荃、王元化父子的如皋師生緣》，江蘇南通：《江海晚報》，2016年3月1日。案：此段資料引自《百年如師》一書中的“師資建設”一節。

㉜《清國留學生法政速成科記事》引自《立教學院百年史》：“志成學校（立教大學）1906.4 美國聖公會所派威廉姆斯主教在築地設立（1874）立教學校，後改稱立教學院。總理塔克為讓清國留學生接受基督感化，且作為日本學校預備教育，向傳道局申請設立新校，並獲許可與幫助。明治三十九年四月，將學校設在學院內。主事為越石乙太郎（台灣長老教會中學校教師）在小田原町設置寄宿舍。明治四十一年末，有學生四十至五十名。持續至大正二年（一九一三年）。”

㉝胡曉明：《跨過的歲月》，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29頁。

㉞林毓生：《論民主與法治的關係》，見《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三聯書店，1988年，第113頁。

㉟參見陳禮榮：《清節自勵的王芳荃》。這段話在後來的《王元化畫傳》中改為“這或許又是他那承自先人的荊蠻血統在‘作怪’吧！”如果我們能夠讀懂王元化的言外之意，就不會簡單的去理解血統說的簡單化表述，其真意也就是受到他父親以及傳承自外公桂美鵬的宗教力量了。

㊱㊲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43頁；第144頁。

㊳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年，第425頁。

**作者簡介：**吳琦幸，湖北經濟學院特聘教授，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研究員，博士。武漢 430205

[責任編輯 陳志雄]